

木、枝、叶与恩

姜圣瑜

写了18年信,寄了18年的钱,如果用个字来概括,《给阿嬷的情书》到底讲了什么?

这个字,也许就是“恩”。恩,是比爱、比情更深沉的伦理逻辑,长在中国人的基因里几千年。

电影里藏着一串隐秘的名字线索。郑木生、谢南枝、叶淑柔——木、枝、叶。树与叶的联系,靠的是枝。木生如树,远赴南洋,是漂泊的根;淑柔如叶,守在潮汕故土,在岁月里慢慢老去;而南枝,则是那根传递养分、长在南洋的枝。

“枝”的角色,远比“传递”更重要。木生去世后,南枝烧掉了即将寄出的信,做了一个决定:以木生的名义,继续写信、寄钱。她靠摆小食摊、开小吃店,从牙缝里一点一点攒钱,一笔一笔寄回潮汕,18年间从未间断。

南枝为什么要这么做?最初的动机也许是“报恩”——木生救过她父亲,替她家打伤纵火犯而入狱,这是救命之恩。后来,这份“恩”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不仅仅是“还债”,还有对淑柔和孩子们的心疼。“恩”字的奇妙之处就在这里:当你真正去还一份恩时,还着还着,就从债务变成了善意,从义务变成了选择,从“不得不做”变成了“我想这么做”。

“恩”是种子。木生种下的那颗种子,在南枝心里长成了自己的大树。

“恩”是中华文化独特的伦理基因。知恩图报,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朴素信念。正是这种信念,造就了谢南枝的执念。她不欠淑柔什么,但她觉得,“应该”让那个远方的女人继续有信可收,有钱可用,有希望可活。这不是道德律令,不是宗教戒律,而是一种刻进基因里的本能:人家帮过我,我就要帮回去。

电影结尾,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终于相见。南枝已经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什么都忘了,却问出一句:“我上次寄的咸猪肉,你有收到吗?好吃,我就再寄。”她忘了全世界,却没忘记给淑柔寄过东西。18年的书信往来,早已把这份“恩”刻进了记忆的最深处。

这部电影的缘起是“侨批”——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家书与汇款凭证的合称。2013年,“侨批档案——

海外华侨银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侨批,承载着一个家庭的生存、一个时代的离散、一个民族的乡愁。

那些在海外的丈夫写给妻子的侨批中,很难见到“爱”字,也很少有“情”字,却有一种更重的东西——丈夫对妻子的“亏欠感”,以及由此生发的“敬惧”。这正是“恩”文化的精髓:最动人的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念你”和“我记得”。

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古训,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吟唱;从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到一代代人刻进基因里的“记得”,这是中国人的“恩”,它从来不是一笔冰冷的账,而是一条温暖的河。它让陌生人变得亲近,让离散者有所依靠,让孤独者有所寄托。它是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密码之一。

中国共产党人最懂得这份“恩”的重量。“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所做的一切为了人民。因为人民有天高地厚之恩——对这份“恩”,要用自始至终的忠诚去回报。

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感恩”了。感恩,从来不是负担,而是前行的力量。因为,心里装着“恩”,脚下才会有根。



给敦煌“通风报信”

冯骥才

煌筹办。

徐悲鸿和梁思成支持这个决定。

常书鸿来到敦煌,有一条曲折坚韧的路。6年前他在巴黎研学绘画时,偶然看到窃取敦煌文书的法国学者伯希和所著《敦煌石窟图录》,即被强烈震撼。他心中怀有奔往敦煌的渴望。1943年,当于右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毅然奔赴敦煌。

此时,张大千正要离开敦煌,常书鸿正好来敦煌。他们好像在做一个伟大的文化使命的传递。敦煌是幸运的。在这里工作两年多的画家张大千不仅临摹大批壁画,还将数百个洞窟进行断代与编号。这是纯个人的行为,却为莫高窟的保护作出首要的贡献。张大千在《我与敦煌壁画》中写道:“学术界对我在敦煌的工作,为文评赞,实愧不敢当。但是能因我的工作而引起当道的注意,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使国人普遍注意敦煌壁画的文化价值,也算略尽书生报国的本分了。”张大千临行时,还给了常书鸿一个

纸卷,叫他回去再看。常书鸿拿回去一看,原来是一张能够在石窟附近找到蘑菇的路线图。这既表达了真正的艺术家之间的惺惺相惜,也体现了当时莫高窟生活极其的艰辛。

常书鸿是1943年3月27日到达敦煌的。张大千5月离开莫高窟去往榆林窟,6月离开敦煌。这期间发生过什么,历史文献总是有限的。然而,今天发现的“孤枝独鸟图”,告诉我们这期间一个从不知道的重要的细节。特别是谢稚柳在画上的题跋提供了太多的信息。

1943年4月3日,也就是常书鸿来到敦煌的第八天。张大千与正在莫高窟考察的谢稚柳一起到常书鸿的住所做客,他们一定是相谈甚笃,告别分手时,张大千与谢稚柳要合作一幅画作为留念。

于是,当场摆开纸墨笔砚。谢稚柳先在画面右上角画了一只长尾的鸟雀。他用了自己擅长的宋人“宣和体”的笔法,鸟儿画得既精工又生动。然而,他只



《孤枝独鸟图》,谢稚柳画,常书鸿题跋

许多好事往往不期而遇。不期而遇的好事往往奇妙无比。

不久前,一家拍卖公司说有人要卖一幅小画,说我可能会有兴趣。他们将这画通过微信发给我。我第一眼便感到这幅画气息特异,非平凡之作。一尺多见方的小画看似简单:一根秃枝,几片老叶,枝头独立一只长尾的鸟雀,背景是寥廓的苍天,其情其境清冷而孤寂。再看左上角的题跋,令我一惊。上边写道:

“三十二年四月三日临别莫高窟与大千居士合写奉书鸿道兄留念并乞教之弟谢稚柳并记”。

左钤二印,一为谢稚柳的闲章(白文)“迟燕”,一为张大千的名章(朱文)“大千”。

我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敦煌保护史上的一件珍贵的文物。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这一年是敦煌莫高窟历史上重要的一年。

当时在画坛上如日中天的张大千,于1941年来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滩,钻进一个敦煌洞窟临摹和研习中古的壁画。他原本计划在这里工作3个月,但这个人类最浩大和灿烂的“画廊”震撼了他。他一待就是两年。其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书法家于右任到西北调查,听说了张大千在莫高窟,去拜访他,他们长谈了两个晚上。张大千对莫高窟伟大的艺术和文化价值看得很透彻,他对当时莫高窟仍像历史的废墟那样处于被遗弃而痛彻心扉。他提出保护敦煌的建议。于右任把这建议带回重庆,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聘请常书鸿到千里之外的敦

儿子6岁那年,我们第一次走进城里的新华书店。

在那之前,我从未进过任何一家书店。

那是个周末。他放学回来,小脸涨得通红,说:“妈妈,老师说书店里有好多好多书。”那个语气,像在说另一个世界。

我答应了他。我没有告诉他,我比他更紧张。我紧张,是因为我从来

没进过书店。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山村里度过的。那时候,一本缺了封面的连环画能在十几个孩子手里传一个月。班主任有一回在课间说:“县城新华书店里有看不完的书。”我不敢想“看不完”是什么意思——书怎么会有看不完的时候?

所以那天站在书店门口,我比儿子慌。

门是玻璃的,擦得很亮。我犹豫了一下才推开。后来我才知道,那家书店几年前重新装修,空间比之前大了整整一倍。难怪推门时,觉得那“哗”地一下涌来的气息,那么阔绰。

儿子倒是不慌。他踮着小脚,认真地念墙上的字——“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念完回头看我一眼,像在确认自己念对了。然后他没有去翻那些花花绿绿的图画书,而是一边走一边浏览,最后选了一本《安徒生童话》,带拼音的。我问他为什么选这本,他说:“因为封面上有海。”那个回答让我愣了一下。一个6岁的孩子,因为封面上的海,选择了一本书。然后他蜷在书架之间的角落里,一页一页地翻。

我坐在他旁边,从书架上抽了一本《小王子》。那一下午,我们谁也没跟谁说话。

回家的路上,他问我:“妈妈,下个星期还能来吗?”我说:“能。”

从那以后,周末去书店成了我们家不成文的规矩。风雨无阻,七八年。那些年,我看着他慢慢变了模样。先是拼音书不翻了,再是图画书不看了。他三年级时有一天,我在厨房做饭,听见他在房间里突出声来。推门一看,他躺在床上,举着一本《夏洛的网》,两条腿蹬得像踩水。我问他笑什么,他笑得说不出话,只用手指着书,眼泪都出来了。

那个场景,我一直记得。不是因为他多爱读书,而是那种笑——那种被文字戳中后的、毫无防备的笑。

他也有读不进去的时候。初一那年,有段时间他回来就把书往桌上一推,说:“读了又能怎样?!”我没说话。周末照常去书店,照常坐在老位置上,照常翻我的书。他跟着去了。沉默了两个星期,慢慢又把书拿起来了。后来他没再提过那句话。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发现自己也开始盼着周末去书店了。不只是为了陪他。自那本小说之后,我又拿了第二本、第三本。我读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有时候读到不认识的字,就记下来,回家查字典。他没问过我读什么,我也没说过。但我们并非坐在书店的地板上,各自翻各自的书,那种安静,很满足。

他高一住校了,就只我一个人去书店。刚开始那阵子,坐在老位置上,我总是习惯性地看一眼身旁。空了很久了。

他快大学毕业时,有一次打电话,说着说着忽然说:“妈,你还记得《夏洛的网》吗?我今天实习给学生试讲,讲的就是这篇。”电话那头他笑了一下。我在这头没出声。

我没什么“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话。我只是想起很多年前,我站在他身后,犹豫了一下,然后推开了那扇玻璃门。

大地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程红

手机里的推送,越来越让人烦了。外卖红包过期提醒,游戏体力已满,直播好物推荐……我一条一条地删掉,像拔草,拔不完。一气之下,有一天,我把所有应用程序的推送权限,能关的都关了。红点、横幅、叮咚声,它们像一群吵吵嚷嚷的推销员,被我拦在了门外。

这个时节的夏天,偏偏也在给我发推送。早晨刚过6点,似乎听到一声蝉鸣从窗外传进来。很短,很轻,像一条测试消息,“叮”了一下就没了。我以为是错觉,翻了个身。过了几十秒,又是两声,接着是四五声,然后哗的一下,整条街的蝉都醒了。那声音不是“叮咚”,是“嗡——”地持续推送,像有人在我后台启动了一个叫“盛夏”的程序。

我没法左滑删除。只好在心里点了两个字:收到。然后,夏天的推送就停不下来了。

下楼买早餐,路过水果摊,老板扯着嗓子喊:“杨梅十块两斤!杨梅十块两斤!”那吆喝就像是一条横幅推送,配图是竹筐里紫红发亮的果实。我本来没打算买,走过去几步,

说不出的好吃。后来有了蒸布,却再蒸不出那个好味道来。

蒸馒头要用大锅,老家这里叫筒子锅,像一口瓦缸,很深,专门用来蒸馒头和做豆腐,或者家里人聚人多,做大烩菜,一般一年也用不上几回。上面蒸着馒头,下面煮粥,一火两用,省事,省柴火,吃起来,有稠有稀。我们家发明了一种粥,这是我妈的创造,就是在粥里放一些葛花,煮出来的粥有一种特殊的清香气,颜色也漂亮,琥珀色的粥里掺着淡淡的紫。每回馒头蒸熟,揭开锅盖,香气满屋。

5月麦黄,镰刀上场,麦黄鸟的叫声连接晨昏。家家要用葛藤捆麦,葛藤也只有这个时候才成为香饽饽。人们拿着快刀,上山割葛藤。葛藤看似遍地都是,却不经割,从远处割到远处,翻山越岭。一般是家里能收多少捆麦子,就割多少根葛藤,但年景

又退回来,称了两斤。

中午在公司,同事端着碗从食堂回来,笑眯眯地说:“今天有凉面,麻酱贼香。”这又是一条推送,关键词是“麻酱”“凉面”“夏日限定”。我手机里已经点了外卖,但还是跟着他去了食堂,又吃了一份。

下午3点,手机屏幕亮了一下。这是一条短信,没法屏蔽,气象部门

夏日推送

宋波

发来预警:“高温黄色预警,未来24小时最高气温35℃。”抬头看窗外,太阳白花花,马路上的热浪像水一样缓缓流动。这就是夏天的系统通知。

夏天给我的这些推送,我一条都没关。而且每一条都认真地看了,体验了甚至参与了。夏天用它最原始的方式,把我从“免打扰”模式里拽

出来。

傍晚,走出写字楼,一股热风迎面扑来,裹着烧烤摊的烟火气、路边栀子花的甜香,还有远处广场舞的音乐碎片。走到小区门口,几个小孩在喷泉边踩水。水花溅到我的腿上,凉丝丝的。一个老太太摇着蒲扇,对另一个老太太说:“今晚有火烧云,好看得很。”我抬头,西边的云真的被烧成了橘红色,一层一层,像渐变的绸缎在慢慢铺开。

我站在那儿,悠悠然看了一会儿,忽有感触,夏天来了,它的推送,从来不需要你授权。它不读取你的通讯录,不分析你的偏好,不询问“是否允许”。它只是霸道地、慷慨地、不计后果地,把一切都推到你面前,热的、吵的、甜的、痒的、亮的、闹的。你只有两个选择:接收,或者稍后。没有“拒绝”,没有“一键屏蔽”。

回到家里,我把窗户推开,让晚风灌进来。风里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抓不住。窗外,不知道哪棵树上的蝉还在微弱地叫,一声长一声短,像后台还在运行的程序。

就在它们无情地推送吧!

画了这一只孤鸟,神气还有些特异:它伫立那里,双目圆睁,目光如炬,镇定而专注。他为什么画这样一只鸟?显然站在左边的张大千已经心领神会。他随后“补景”,画了一根光秃秃的枯枝。他叫这鸟“独立枝头”。他还在左下角,同样采用宋人画法,双钩填色,画了一束俊美的老叶,然而叶面上有虫噬的孔洞。此时的常书鸿一定明白,这不是一般的花鸟画。这束带着虫噬孔洞的老叶是莫高窟,这只独守枝头的鸟儿正是他自己。两位画家知道他即将开始保护伟大的敦煌的事业,深知大漠的荒凉和守护莫高窟的寂寞与艰辛,便把对他的期望、赞美、支持的深情寄寓笔墨之间。文人以诗词互答、书画相赠为传统,以至我们今天读画时,能深解其意,深受感动,从而感受到那一代艺术家对祖国文化的爱,他们的担当与良心!

这幅画不应该飘落世间,不应私藏,应该回归敦煌。它是在敦煌画的,它是敦煌保护史上一个十分珍贵的细节。它是敦煌重要的文物。我要“通风报信”,尽快把这事告诉敦煌。

有幸的是,敦煌研究院的摄影家、同样在敦煌奋斗了一生的吴健来天津大学做《敦煌的数字化保护》的演讲。我见到他,把这幅画告诉他,并把照片发给他。

三天后,吴健打电话告诉我,敦煌那边已有民间人士买下这幅画,有意捐赠给敦煌研究院。

于是,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稳妥感。敦煌的历史,没准儿因为这幅小画,会更丰满、更生动、更有说服力和一种文化的精神。



《新年画《晏清香入夏来》,作者李红。

下午4点多钟,晚市渐渐开始了。

在这条仄仄的老街,各种生意都出来了。烧烤摊的将三只烤得焦黄的烤鸭挂在铁钩上,等距离摆放,还仔细微调了一下,以保持美观。卖淮南牛肉汤的女摊主将一袋烧饼从袋中取出,一只一只围在铁桶边上,她的丈夫则慢悠悠地将一个二维码收款牌挂在遮阳棚。穿浅黄色短衫的卖花妇女把她的花一盆一盆摆在推车上。卖淮南牛肉汤的问: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她说:太热了,来那么早也没事,现在来也是给花浇浇水。耳边传来叫卖声:来了来了,十块钱两斤。来了来了,包你熟,又沙又甜,先尝后买,十块钱两斤,十块钱两斤。

又是一个高

声传了过来:“龙虾——龙虾——小龙虾……”

在巷子南头,右转一条窄巷,有一家理发店,夫妻俩经营。男人瘦瘦高高,负责理发。女人瘦瘦小小,有来洗头的,她就给洗头。几年来我一直来这里理发,直接推一个短发,只十几元。可他每次都给我认真打理,剃好了还要端详一会儿,仿佛我的头发是他的一个“作品”。有时过去,他正好不在,他老婆说,接孩子去了。我便等一会儿。他这个小店,是个二层小楼,靠墙一个楼梯,经常常见他的大儿子从楼上走下来,也不说话。时间长了,我

问,老大这么早放学啦?男人才对我说,老大生下来智力不太好,到两三岁才发现,到处求医,可是已经晚了。因此,老大就这么困着。

等到一阵摩托车响,店主回来了,小儿子从车上下来,蹦跳着跑回店里。男人走进店,见我在那里等着,放下头盔就过来给我围上围布,剃起头来,一边命令小儿子:“别跳了,赶紧做作业。”小儿子放下书,噢了一声,趴在小桌上写了起来。他的老婆在一边坐着,笑模笑样,嘴角漾出一丝快乐。

同样在巷子

最里边,有一对卖馄饨的小夫妻。这真是一对妙人。男的年轻英俊,女的小巧玲珑。他们每天

在黄昏中摆下摊

位,整个晚上都忙碌着,直到夜里两三点才能收摊。可他们总是快乐地忙着。我每次去买馄饨,女主人会笑着说,多给你两个,老主顾了。又说要不要香菜呀!听她说话,总让你感觉到亲切自然。后来我知道他们是金寨山里人,已有了一个3岁的孩子。孩子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看,他们则到城市,租住在城郊的民房,做起了馄饨的买卖。让我惊奇的是,黄昏的霞色并不能遮挡他们脸上快乐的阳光。

是的,有时候快乐是无谓理由的。

黄昏中的市声

苏北

读五年级时,教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个外地人,姓庄。庄老师有个习惯,用葛花当茶。那时候,很少有人喝得起茶叶,我们当地不产茶叶。我那时猜想,庄老师一定是为了省钱,一个人背井离乡,家里一定还有亲人等着花钱。他的工资好像每月二十几元。茶叶要到商店里买,不便宜,而葛花漫山都是。

庄老师的桌子上,总有一个玻璃瓶子,上面的标签还留着,是“黄桃罐头”。标签纸把瓶子包了一圈,严严实实。没有包裹严实的底部和上部,露出淡紫色的茶水,有时浓,有时淡,我知道那是葛花水,它与我家蒸馒头煮粥时的气味一模一样。

除了上课,庄老师就在房间里待着。透过门帘,我们看到庄老师就在房子里静静坐着,有时批改作业,有时发呆,或一杯杯喝着葛花茶,似乎总是

喝不够。早上或傍晚,有时会独自一人到峡河边上赏芦花。他站在水边看芦花,一看就是很久,流水倒映着他和芦花的影子,并带向远方的下游。下游是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也许老师知道,也许他的家就在下游的某个地方。那时候,有一种芦花叫荻,只有荻开纯白的花,白得像雪,无比轻盈。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荻渐渐没有了,只剩下了芦苇和芦竹,花不怎么白,有些斑驳,有些老气。

过完年,开学了,庄老师没有来给我们上课。庄老师去哪里了,我们都不知道,那时候还小,不知道从哪里打听,也不敢打听。

很多年后,我读到了两首诗:葛花满把能消酒,栀子同心好赠人。这是唐人韩翃的《送王少府归杭州》。我读书少,读诗更少,四方飘蓬,这是我读到的唯一写葛花的诗。

葛花

陈年喜

有丰歉,谁也没说个准儿,大都会多割一些,有备无患。用不完的,晒干了,可以当柴烧,或者放到楼上,第二年放在井里泡软了,一点不影响再使用。粗壮的葛藤会生出好多枝杈,

枝杈上都开着葛花,粗心大意的人就把它们留在整根葛藤上,一同带回来。背麦的人背着麦捆往家走,金黄的麦腰上一片紫蓝,仿佛麦捆开了花。